



近代名文导读

近代 经世文选

经世之学是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一个特定文化形态。既继承了古代儒学的传统，又包含了近代某些文化。



主编 戴逸

注译 林庆元等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近代名文导读

近代经世文选

JINDAI JINGSHIWENXUAN

主编 戴逸 注译 林庆元 等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经世文选/林庆元等注译. —成都:巴蜀书社, 2011. 5

ISBN 978-80752-808-1

I. ①近… II. ①林…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文集
IV. ①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1621 号

近代经世文选

JINDAIJINGSHIWENXUAN

主编 戴 逸 注译 林庆元等

责任编辑 陈亚玲

封面设计 张 科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发 行 科 028—86259422 86259423

网 址 <http://www.bsbook.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1mm×225mm

印 张 12.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2-808-1

定 价 23.00 元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电话:028-84122206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杨东梁 段志洪

序 言

戴 逸 杨东梁

十四年前，我们曾编辑过一套《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共 39 册，由巴蜀书社出版。当时，我们诚邀了十几位在京的文史专家和出版社的几位高级编审组成编委会，同时，约请了数十位研究有素的作者，共同成就了此套丛书。

之所以要编辑该丛书，是要让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更多地了解一点近代中国人是如何历尽千辛万苦，探索富国强兵之路，寻求救国、救民之途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既坎坷、崎岖，又光辉、悲壮。在祖国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难之际，中华民族逐渐觉醒，奋起抗争。许多仁人志士高扬爱国主义旗帜，为祖国独立、民族复兴呼啸着前进，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和生命，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勇慷慨、气壮山河的乐章。

文学是时代的心声，中国近代文学就充分突出了爱国主义这个主旋律，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跨过道道难关，迎来光明的前程。而今天的青年人既没有一百多年前那种举步维艰、风雨如磐的感受，也缺少较为丰富而形象的近代历史知识。阅读近代名人名家撰写的名著名篇，则可以引领他们进入那个逝去不久的时代，聆听其心声，体察其情感，品味其所思所求，从而更深刻地认知我们国家和民族所走过的那段路程。

今年，适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辛亥革命是 20 世纪初中国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影响和伟大意义的事件，是鸦片战争以来一次完全意

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是我国民主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而且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辛亥革命为中国现代化的继续前进开辟了道路。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们与巴蜀书社商定，从《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中选出十二种，分别编成两套丛书：一套冠名为《辛亥百年——名家经典导读》，共收六种，即：《孙中山文选》、《黄兴宋教仁朱执信诗文选》、《辛亥烈士诗文选》、《章太炎诗文选》、《康有为诗文选》、《梁启超诗文选》。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具有坚定的革命信仰，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为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献出了毕生精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为中国的民主革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留下了数百万字的遗著，其中不乏思想深邃、语言犀利、富有文采的名篇佳作。

黄兴、宋教仁、朱执信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人物，是革命党人中的杰出代表，也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他们或因操劳革命，英年早逝；或为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成为“为宪法流血”第一人；或极富理论才华，却惨死在军阀屠刀之下。他们的诗文都有强烈的爱国、战斗精神，但其艺术风格却不尽相同，或慷慨悲壮，或清新淳朴；或奔放，或含蓄；或犀利，或深邃，因人而异，各具特色。

我们还选收了三十多位辛亥烈士的诗文遗作，这些烈士具有坚定而高昂的革命斗志，并充满着必胜的信念。他们把生命的价值与祖国的富强、同胞的幸福紧紧联系在一起，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其诗文有的是临阵发出的誓言，有的是临刑留下的遗篇，真可谓声嘶力竭，句句铿锵，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一页。

章太炎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鲁迅说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他那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尖锐地批驳了保皇派的谬论，酣畅淋漓，脍炙人口。他一生著述颇丰，涉及面广，于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学诸方面均有建树。尤其是他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鲁迅语），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可贵的精神财富。他晚年虽脱离民众，渐入颓唐，但也不过是白圭之玷，瑕不掩瑜。

康有为、梁启超虽然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但在辛亥时期也是政坛和思想界的活跃人物。他们宣传保皇，反对革命，追求君主立宪，与革命派进行了激烈辩论。把康、梁的诗文收在《辛亥百年》丛书中，可以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辛亥时期涌动着的不同思潮，展现出的不同政治主张。须知，正确的思想总是在同错误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两者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更何况康、梁也曾经位列中国近代向西方追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中，也曾一度领舆论之风骚，只不过当时代继续前进时，他们未能追上潮流，成了落伍者。

另一套丛书冠名为《强国之梦——近代名文导读》，共收录了《近代实业文选》、《近代法制文选》、《近代教育文选》、《近代报刊文选》、《近代经世文选》、《近代名人日记选》共六种。这是从文学体裁角度入手，选编近代仁人志士为追求国家富强而发出的声声呐喊。

振兴中华的有志之士围绕如何使中国转弱为强的现实问题，提出“兴实业”、“振商务”，学习西方。有人更身体力行，将“实业救国”论付诸实践；近代的爱国者在寻求民族振兴的道路上，还提出了改革政治及法律制度的种种主张和方案，推动了中国法制思想和法律制度的进步；至于教育，更为历代中国人所重视，时至近代，有人甚至提出“教育为立国之本”，而资产阶级革命家则提出“革命之教育”，把中国教育思想推向了一个新阶段；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资产阶级的诞生，近代报刊也在中华大地上勃然兴起。开始是外国人在中国办报

纸，至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中国人自办的近代报刊，他们鼓吹以西学为师，变法图强。甲午战争后，办报形成热潮，并成为传播启蒙思想，宣传救亡图存的锐利武器。辛亥之后，革命报刊如雨后春笋，有力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此外，由于报刊文具有时效性、纪实性和趣味性，自然得到读者的青睐，对当时社会的思想、政治、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说到近代经世文，顾名思义则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产物，它宣扬进化史观和社会改革思想，标榜“采西学”，开风气，睁眼看世界，力图为纠封建末世之“时弊”而寻找一条新的出路；近代名人日记涉及近代一些著名人物的思想、活动，而且往往是亲历亲为，可作为其他史籍的佐证，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再则，有些日记出自文学名家之手，更显得细腻生动，文采斐然。

我们今天能够重新编辑这两套丛书，一是出于巴蜀书社的积极推动，二是有诸多作者的大力支持。由于巴蜀书社的编辑先生们精心策划，反复推敲；各位作者兢兢业业，认真修订，终于得以在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内，将两套面目一新的丛书奉献于读者面前，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星移斗转，物是人非，在我们今天重温旧章之时，其中两位作者——桑咸之教授、林庆元教授却已驾鹤西去，这让我们唏嘘不已，悲痛系之！两套新版丛书的推出，也是对他们的纪念吧。

2011年4月于北京

前言

经世思潮，也称实学思潮。它产生于明代以至清初，而发展于嘉道年间。要说清楚经世思潮，就得先介绍一下孔子和他所创立的学说——儒学。孔子（前 551—前 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他一生重视教育，并为了把古代的贵族礼仪和各种知识传播到民间，设学授徒，且整理了《易》、《书》、《诗》、《礼》、《乐》、《春秋》，即所谓“六经”的古代文化资料，成为两千多年来知识分子必读的经典。其后，他的一些学生也相继讲学，逐渐形成“儒家”学派。然而，儒学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有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的。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其中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政”思想，主张“民本”。汉代，董仲舒以注经的形式，融入了道家的哲学思想，宣扬“三纲五常”理论，思想界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到了宋明时代，理论家也借注经的形式，发展了儒家思想，对人际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把人的自我完善、内心修养提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地位，强调“存天理，灭人欲”。这种以儒、道、佛为特征的学说，被称为新儒学，也称宋学、理学。朱熹为正统派理学之集大成者。理学成为支配中国思想界的正统学说。清初，康熙皇帝由于统治的需要，进一步把理学捧上正统官学的位置，使之成为红极一时的统治思想。

明代中叶以后，社会政治危机日益严重，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倾轧，造成了明王朝的衰落。于是当时有识之士开始探讨这种危机形成的原因。他们认为，社会危机的造成原因之一是由于理学的空疏和迂阔学风。因此兴起了批判程、朱、陆、王的理学和心学，提倡“崇实

黜虚”的精神和学风。这一派的具体主张表现为：1. 批判精神；2. 经世思想；3. 科学精神和启蒙意识。它一方面批判理学，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经世”思想。主要代表人物有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顾炎武（1613—1682）的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他的学问，可以归结为“崇实致用”，对心学和理学持批判的态度。他讥理学为“禅学”，是“内释而外吾儒之学”，认为偏离了孔孟之道，主张“务本原之学”。他对转变明末清初的空疏学风，有深远的影响，成为“经世致用”的先驱。黄宗羲（1610—1695）提出矫良知之弊、以实践为主的主张，并毕生身体力行。他重视研究文学、经学、天文、历算、音律学等实际学问。他敢于大胆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提出“君臣共治”、“工商皆本”等启蒙思想，成为近代启蒙思潮的先驱。王夫之（1619—1692）提出“尽废古今虚渺之说而反之实”，并对宋、明理学作了批判和总结。他从研究经学、史学、天文历算等实学中总结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成为经世思潮的哲学基础。此外，明末清初还产生了一批如徐光启、方以智等为代表的科学家。在中西自然科学交汇的时代，他们提出研究“象数之学”，认为数学、几何是一种科学认识的工具。徐光启还译有《几何原本》，并编《农政全书》。后者已开始使用实验方法来进行科研。总之，他“平生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另一位科学家方以智则十分重视“原则”，提倡实证的科学方法。这些从另一个方面，构成了实学思潮的重要内容。

经世思潮发展的同时，到康乾时期，考据学也进入全盛时期，成为学术界的主流。戴震、惠栋、阮元为其代表。这时的朴学（考据学）与清初顾炎武的实学已不同。乾嘉考据学是士大夫为了逃避现实，免遭文字狱之祸的产物。他们虽然重视史实，在鉴别真伪、保存古籍方面作出了贡献。但这个学派因不问政治，醉心繁琐考据而逐渐偏枯。

道光以后，由于乾嘉“盛世”的迅速消失，社会矛盾的激化，加上西方开始入侵，使有识之士从“皓首穷经”书斋里惊醒过来，逐渐地认识到“衰世”的到来，进一步反思汉学的“诂订琐屑”，宋学的空疏无用。于是，士林风气又为之一变；由古文经学走向今文学，由考据走向“经世致用”。常州的庄存与、刘逢禄及其学生龚自珍、魏源则代表了这一时代学风的转变。如果说龚自珍“经世致用”思想的特色在于“讥切时政、诋诽专制”，那么魏源的“经世致用”的特色则在于“兴利除弊”。而后者的思想，已超过了经世实学的水平，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他的思想开启了后来的洋务思潮。因此，龚、魏既是明清实学的继承发展者，又是近代新学的先驱。

道光年间，经世思潮再度高昂，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嘉庆以来，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如人口倍增而土地相对减少，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加重，赋税以及高利贷的盘剥，吏治黑暗，贿赂公行等等，都激化了阶级矛盾，引发了白莲教、天理教和天地会等秘密结社为核心的农民起义。“乾嘉盛世”由此迅速走向衰落。一些封建士大夫为挽救封建制度，寻求对策，便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注重研究社会实际问题。更重要的是鸦片战争的爆发，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和落后，促使一些士大夫去探讨中国何以弱，西方何以强的原因，从而产生了“睁眼看世界”的新观念、新思想。这些新观念、新思想，便构成近代经世思潮的主要内容。

道光年间的经世思潮，是明清实学思潮继承和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应该看到，它也有自己韵时代特点。除了上述面向世界的新思潮外，就学派而言，则出现了汉、宋调和或融合的趋势。如曾国藩原来崇尚理学，后来也主张汉、宋兼蓄，提倡义理、考据、词章、经济熔于一炉的“经世之学”。这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此外，还有像陶澍、林则徐、贺长龄、李兆洛、包世臣、姚莹、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楨这样一批经世派。道光六年，魏源代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标

志经世思潮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全书分学术、诏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纲，六十五目，共120卷，是一部断代经世论文总集。大部分是有关漕运、盐政、荒政、钱币、水利及军事方面的内容，选辑清初至道光以前的论文、奏疏、书札等而成，贯串了经世致用的宗旨。它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极大，为近代多种经世文集开了风气。

这些经世派，已不像宋学家那样，排斥异己，独尊儒术。相反，他们兼收并蓄，对各个学派加以包容。他们不仅研究儒家，而且也研究诸子百家，注重的不但是学术理论，还主张“通经致用”，用经学来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和国计民生。概括地说，有以下几点：

(1) 由于他们要求改革时弊，便不能不对僵化的保守的正统理学进行清算和批判，从而使人们扩大研究视野，转变学术风气。如龚自珍在深刻揭露封建政治弊病的同时，还对儒学一尊的地位提出挑战，公开宣称：“兰台序九流，儒学但居一”，并猛烈地抨击理学使人“疲精神、耗目力”，是“无用之学”，讥汉学为“琐碎恒订”。显然，他认为学术风气必须抛弃空疏与繁琐，方有益于世。所以他宣称：“好杂家之容”，提倡“东西南北之学”，研究边疆史。又如包世臣，更明确地斥责宋学只知空谈性命，“鄙夷田事”。这些呐喊，对转移社会学风，使之趋于务实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思想界包容其他学说（包括西学）开辟了道路。

(2) 宣扬进化的历史观和社会改革思想。龚自珍模糊地认识到，变化是一种历史趋势，指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他根据这一进化的历史观，向清政府提出“更法”，指出清政府不能“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议”，否则就可能改朝换代。魏源则更进一步反复证明历史变革是不能逆转的。“虽古之圣王，不能使甲兵之世还于无甲兵”。但他认为，要变的只是器，而“其不变者道而已”。即君臣、父子、夫妇这些封建伦理及秩

序不能变。这种理论即为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开端。

(3) 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观点。历来理学家宣称不言利、只言义，以维护其剥削制度，把言利的市民看做小人。这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种压抑。而龚自珍则公开宣扬“言私”、“言利”、“言富”。魏源则提出保护“有田之富民”与“无田之富民”，主张“利国、利民、利官、利商”。此外，还提出在河工、漕运、盐政、农政方面的兴利除弊。这一切，都对封建主义价值观有一定程度的冲击，为洋务运动做了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准备。

(4) 重视科学研究和实验。经世派反对唯儒家书籍是尊，不薄杂家。林则徐十分重视“研究舆地、象纬及经世有用之学”，而且研究《农政全书》、《潞水客谈》等书，重视农学，提倡水利，进行科学实验。魏源的《海国图志》还特地辑录了西方近代天文地理及军事科学知识的有关文章。经世思潮为科学发展创造了一种良好的学风，使知识分子从儒家的典籍里摆脱出来，扩大了学术视野，培育了一批近代早期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詹天佑等。

(5) 学习西方。鸦片战争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同时也使近代经世思潮有了新的时代特点和内容。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打破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高墙，这是几千年来一大变局。在这形势面前，经世派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开始从注重“时务”扩大到注重“夷务”。为了反抗外国侵略的需要，他们留心了解外国事务，进而学习“洋务”。林则徐在广州为此编译《四洲志》。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经世派学西方思想的具体和重要表现。到60年代，经世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冯桂芬撰写的《校邠庐抗议》，提出了“采西学议”，比以往更系统地提出了社会改革的主张，有更具体的学西方的议论。经世派事实上是学西方的倡导者和开风气者，经世之学包容了“洋务”和西学。

在“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的观念指导下，了解西方史地，成

为近代经世思潮的重要内容。林则徐编撰的《四洲志》，体现了睁眼看世界的时代风气。接着，魏源编《海国图志》，这是当时由中国人自编的最为详备的一部关于世界各国地理、历史概况和社会现状的书。该书不但对开拓中国人的眼界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日本明治维新人士所推崇。稍后，曾任福建巡抚的徐继畲也编有《瀛环志略》一书，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南亚的风土人情、史地沿革及社会变迁详加记述。此外，面对列强对中国边疆扩张的形势，不少经世派重视对边疆史地的研究。他们揭露列强对边疆的蚕食，呼吁加强边疆设防。姚莹的《康輶纪行》一书，考察了我国西藏地区的史地和社会宗教风俗，揭露了英国侵略西藏的野心，使经世思潮带有更鲜明的爱国主义的时代特点。

(6) “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我国一种优秀的思想传统。《尚书》里就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及历代进步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思想。进入近代，民本思想也为经世派所继承。林则徐像历史上的一些思想家一样，把人民当做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重视民心向背，重视民智，爱惜民力。虽然不能说经世派是“民本”思想的唯一继承者，但应当承认，一些具有经世致用思想的政治家、思想家往往比较重视民心，重视民力。因而，主张在政治上“整顿吏治，团结民心”，实行一些有利于民的改革。在对外关系中，也主张“民心可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或利用民众力量抵抗外来侵略。

经世之学在近代究竟有什么影响呢？应该说，它是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一个特定文化形态，既继承了古代儒学经世的传统，又包含了近代某些文化，如西学和洋务。经世派从注重“时务”到注重“夷务”，是经世思想在新条件下的发展。所以，经世思潮是从传统文化过渡到近代文化的桥梁。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改革思潮，较为务实，所以容易抛弃门户之见及“夷夏之防”。“学以致用为贵，本无中西之殊”，正是反映经世思潮的特点。一些曾经调和汉、宋，接受经世思

潮者如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楨、丁日昌、郭嵩焘，到60年代成为洋务思潮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这批人与道光年间的林则徐、魏源、贺长龄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冯桂芬（1809—1874）的思想则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冯是林则徐的门生，1862年成为李鸿章的幕僚。他在这期间写的文章，收入《校邠庐抗议》和《显志堂稿》，对清政府的漕运、盐政、农政均提出改革主张，特别是《采西学议》，更具有洋务思潮的色彩。他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事实上成为洋务派活动的指导思想。可以说冯桂芬是从地主阶级经世派转向洋务派的过渡人物。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他的洋务思想更加深刻地打上经世思想的烙印。少年时，左宗棠曾认真阅读《皇朝经世文编》及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在贺熙龄、贺长龄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他的经世思想。左宗棠对林则徐、魏源都非常崇拜。后来他在福建马尾创办的福建船政局，可以说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具体实践。左宗棠自己也把这看做是龚、魏经世派在鸦片战争对期提出的主张的继承。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左与经世派思想的密切联系，以及受到的影响之深。另一位洋务派先驱曾国藩（1811—1872），早年拜理学家唐鉴为师，学崇程、朱。鸦片战争后，又对古文经学发生兴趣，力主调和汉、宋，并汲取汉学中的实事求是的方法，这正是他后来敢于正视现实的根源。他在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刺激下，思想日渐变化，由程、朱而求“经世之学”，提出儒学“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对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颇为推崇。可以看出，汉学家和理学家的一部分人，都在社会危机刺激下汇集到经世致用思潮中，为纠封建社会之“时弊”而寻找新的出路。

经世思潮，指的虽是一定时期的社会思潮，然而，它的影响却不仅对洋务派，同时也延及维新派。梁启超主讲湖南时务学堂，制定的《学约》里规定：“今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

经学仍为资产阶级维新派所重视的一门学问。因此，维新派大多在面向西方的同时，往往把“经世致用”的儒学作为自己的思想前导。经世派的历史进化史观，“更法”的革新观念，“富民”的经济思想，都给维新派以直接的启迪，有的甚至直接利用他们的口号，而注入资产阶级内容。到康有为那里，便归结为“托古改制”，使经世思潮与资产阶级变法结合起来，并披上一层经学的外衣。不过，康有为的维新思潮毕竟不同于经世思潮，它所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要求，是近代思想文化，仅仅把经学作为一种借用的形式，而其思潮文化的基础正是西学，虽然也糅合了中学，但毕竟后者不是主要的。从趋势看，经世思潮到这时期也逐渐淡化了。

经世思潮传播的同时，各种“经世文编”也先后出版，盛行于当时。以陈子龙为代表的复社君子编印《皇明经世文编》之后，继有1826年贺长龄的《皇朝经世文编》。此后，按此体例及宗旨续编的经世文编，不下二十种。如张鹏飞的《皇朝经世文编补》、饶玉成的《皇朝经世文续编》、葛士浚的《皇朝经世文续编》、盛康的《皇朝经世文续编》、陈忠倚的《皇朝经世文三编》、何良栋的《皇朝经世文四编》、甘韩的《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于宝轩的《皇朝蓄艾文编》，以及民国初年的《民国经世文编》等。收入作者有中外人士一千多人，文章14000篇，大约在三千万字上下。现将主要几部略加介绍：

一、《皇朝经世文编》、《皇朝经世文编补》。《皇朝经世文编》是清代以“经世文编”命名的第一部。该书版本非常多，影响较大。1849年，张鹏飞又补了381篇，称《编补》。张鹏飞，陕西安康人，主持过安康书院讲席。该书所补侧重西北，思想较为保守，影响不大。

二、《皇朝经世文续编》三部。第一部《续编》由饶玉成辑，成书于1882年，收录康熙至同治、光绪间的论文。此时洋务运动已进入高潮，编者虽然认识到“洋务为千古创局”，但并没列纲编选，只

是收入了一些有关的论文而已。编选不够严谨，且不标明时间，并删去奏折的“由头”，错讹也不少，印刷不甚精审。第二部《续编》又名《新增续编》，120卷。葛士浚辑于1888年。葛士浚（1845—1895），上海人，一生未曾任官，留心经世，对算学颇有研究。本编选辑清初至光绪朝论文。重要特点是在八纲之外另立洋务一纲，又在学术纲下另立算学一目，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潮的变迁。第三部为盛康（即盛宣怀之父）辑于1897年的《续编》120卷，续选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文章。所收内容以奏议为主。他认为“经世之作在行事而不在文章，备掌故不备体格”，这也是他的选文标准。体例方面则回到八纲，但子目却大为增加，如“厘捐”、“开矿”、“建置”、“圣学”、“水师”、“团练”、“台防”、“饷需”。取材广泛，所收奏折都标有时间，使用起来十分方便。

三、《皇朝经世文三编》、《皇朝经世文三编增附时事洋务》。《三编》是陈忠倚在1898年编辑，是续编的续编。收入1888—1898年十年间的论文。这时期，近代中国社会已从洋务思潮演进到维新思潮，因而，本编所反映的，大多是新政有关的政治，讲求富强之术，且兼收外人之议论，所收入的有丁韪良、李提摩太等传教士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本编体例与《续编》相同，只是删除与经世无关的，增加了有关富强的新目。但该书所收文章均无出处，检索极不便。另《皇朝经世文三编增附时事洋务》，于1897年成书，编者甘韩。该书选收1895—1897年的文章78篇。编者鉴于有志之士多弃帖经而事西学洋务，于是决心依照经世文体例，辑成洋务三编，收录有关论自强、御外、理财、印花、邮政、矿务等“时务”以及有关东西方各国社会历史、外交、经济、文化、风情、宗教等文章。该书无纲目，不记出处，不便检索。

四、《皇朝经世文四编》，1902年何良栋辑。当时正处新政之始，这类书十分畅销。如他序言所称：“国家讲求实学……于是经世文编